

黃永年文集

黃永年文史論文集

第四冊

文史論考

中華書局

黃永年文集

黃永年文史論文集

第四冊

文史論考

文 史 論 考

目 錄

新文化運動和傳統文化	1
要批判封建主義,必須揭示歷史真相	3
釋“土伯九約”	8
評徐中舒先生“委蛇”論	11
神話中的一種怪蛇——“委蛇”	18
關於《爾雅》的“威夷”及其他	22
子楚夫人考	26
“俞兒”考	28
鄴城和三臺	32
說陶淵明的愛酒	43
故事傳說的一個例	49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正義	53
佛教為什麼能戰勝道教	67
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係	73
補論“狐”與“胡”之關係	81
驪 宮	86
行幸驪山季節	92
考唐長安城內兩個缺失的坊名	96
唐代傢具探索	101

唐代的漆背金花鏡	116
釋敦煌寫本《雜鈔》中的“面衣”	122
魃頭與方相	127
“方相”的流變	130
怎樣從“魃頭”變成鎮墓獸	136
戰國漢唐明器中的木俑	139
漢唐明器中的木馬	148
論唐代明器群中的瓦質怪獸	151
論木明器在古明器中的地位	155
時儼中的十二獸	160
《十二支神像》補考	165
唐代的十二神	168
玉 俑	170
唐代的玩偶——新婦子	172
宋代的明器制度	175
元明的明器制度	180
近代的明器制度	185
明器稱謂考	190
書法源流雜論	197
篆刻藝術	240
碑刻學	250
胡 床	290
說餅——唐代長安飲食探索	292
說“朴刀”	297
傳疑的柴窑瓷器	306
關於《偽古文尚書》	310

楊貴妃和她的故事	314
李商隱的《利州江潭作》究竟說什麼	333
《纂異記》和盧仝的生卒年	340
重論施彥端是否施耐庵	352
關於《二郎搜山圖》	364
不妨一讀的鬼故事	368
迷信釀成的悲劇	
——讀《曹輔墓志》	370
《西洋記》裏金碧峰的本來面目	372
莫忘明末英雄	384
雍正之即帝位真是秉承康熙遺詔嗎？	387
從三峰鐘板的恢復說清高宗對世宗時事的翻案	389
論王靜安先生“二重證據法”的歷史地位	405
陳寅恪先生稱譽趙宋文化之解說	418
不準向街開門的歷史	422
二百年前江南社會的剪影	
——讀《珠里小志》	424
編撰《書目答問》新本芻議	427
讀《我們仨》後的一些聯想	429
一篇誣蟻胡適竊書的奇文	433
來函照登	436

新文化運動和傳統文化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討，近若干年來似已形成熱點了。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卻稍見冷落，有點被擯為過時貨的味道。甚至某些人公然聲稱，北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左了，過激了，要像清華的吳宓那樣，編出和新文化運動對抗的《學衡》，才能“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地發揚傳統文化並吸收新知。這麼來講中國傳統文化，在下自然只有敬謝不敏，用句《論語·衛靈公》裏的老話來說，即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也。

我認為“五四”實在是否定不得的。1998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海峽兩岸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研究學術討論會上，我提交論文《百年來的中國古文獻研究》並作了發言，認為百年來亦即本世紀在古文獻領域裏所有突破性的重大成就，包括對古文獻領域之作擴展，對古文獻時代性之作審查，對校勘古文獻之提出若干理論，對注釋古文獻之打開新格局，以及對古文獻之作新式標點和索引等項，無一不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賜，本身並成為了“五四”新文化的組成部分。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古文獻研究以至傳統文化研究領域裏只能如某些清季學人那樣憑借乾嘉諸大師的唾餘過日子，是出現不了如上所說種種嶄新局面的。

這當然不是說這些“五四”以前的學人本來就學識不行，而實係時代局限了他們，試想生活在經濟上雖受衝擊但文化上依然故

我的封建社會裏，怎麼能呼吸到講民主講科學的新鮮空氣而來個改弦易轍呢？這從其後戴季陶之流對否定封建偶像三皇五帝者要扣以破壞全國人民團結的罪名，章太炎先生之不信甲骨刻辭和譏斥銅器銘文等等，都可看到封建傳統文化中落後面的頑固性，即使在“五四”的猛烈攻擊下仍不願痛快地退出歷史舞臺自行消亡，更何論“五四”以前！“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必要而非過激，由此也顯而易見。

我是堅信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封建社會所形成的傳統文化，說它完全適合於社會主義哪怕是初級階段，今天應該是不會再有很多人相信的。那麼，取其裨益於今天的精華，棄其有害於今天的糟粕，豈非無可爭辯的事情。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講民主講科學，應該是棄封建文化的糟粕而揚其精華的正確途徑。上述本世紀古文獻研究的超越清人的新成就，以及較此更重大的思想領域的新成就，尤其是由此產生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都證實了這一點。而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種種變種之終於為時代所淘汰，自亦決非偶然。

因此，我認為要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只有繼續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條講民主講科學的坦途。講民主講科學之反封建，正是反其糟粕而並非反其精華，也正是反了糟粕才更顯出精華之對建設社會主義的作用。至於任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變種，奉勸切莫繼續提倡，因為這個“中學為體”的“中學”其實是包含着糟粕的封建主義，而時至 21 世紀還想立足於這樣的封建主義，實在不僅是可悲而且是十分可笑的事情。

要批判封建主義，必須揭示歷史真相

批判封建主義的文章逐漸多起來，這是好現象。但有些文章似乎不够科學，特別是 1980 年春天報刊上刮起一陣歌頌唐太宗李世民之風，其目的大概想以李世民的某些高明之處來批判今天社會上存在的封建主義殘餘。殊不知這樣做實在有點“南轅北轍”，想批判封建主義而實際上起了美化封建主義的作用。因此我提出：要批判封建主義，必須如實地揭示歷史真相，不能因為某種需要而對某些歷史上的人和事加以美化，當然同樣也不能因為另一種需要作背離事實的醜化。

寫歌頌李世民文章的會說：我歌頌是有文獻作依據的。是的，我所讀到的歌頌李世民的文章都引用了一些歷史文獻，如兩《唐書》、《通鑑》、《貞觀政要》之類，其中以引用《貞觀政要》者為多。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隨便找幾條文獻舉幾個事例來論證自己的主觀設想。正當的辦法只能是力求全面地掌握文獻資料，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考證和分析，弄清歷史的真相，從而找出點規律性的東西。《貞觀政要》是從《太宗實錄》裏摘錄李世民的政績加以分類編纂成書的。《舊唐書》裏《高祖紀》、《太宗紀》也是《高祖實錄》、《太宗實錄》的節本，而《高祖實錄》已是李世民從高祖李淵手裏奪取政權以後纂修的，把功勞一切歸於李世民，把李淵說成是依仗兒子李世民成事的昏

君，把被李世民殺害的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說成是死有餘辜的凶險之徒。《太宗實錄》更是一味對李世民歌功頌德，《舊唐書》有關的列傳以及《新唐書》、《通鑑》也無不是在這種調門下撰寫的。用這種被封建皇帝李世民歪曲過的文獻來歌頌李世民本人，還要想在批判封建主義中起點作用，所以我說是“南轅北轍”。

我認為還是如實地弄清歷史真相好得多。在李淵太原起兵到進入長安稱帝這一段，有李淵的記室參軍溫大雅所記未經後來竄改的《大唐創業起居注》，其中講得很清楚，太原起兵的主謀決策者和最高指揮者是李淵，大郎李建成和二郎李世民在李淵的指揮下同樣建立了戰功。李淵稱帝後到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軍事政變前這一段第一手文獻已看不到了，但一人手難掩天下目，篡改史實總難以篡改得十分乾淨不透露一點真相，從《舊唐書》本紀列傳中透露的點滴歷史真相來看，李唐皇室統一戰爭的勝利並非李世民一人之功。當時習慣皇太子要留京師居守，經營山東地區的重任自然落到次子李世民身上，四子李元吉則充當李世民的副手。平定山東的決定性戰役是破竇建德、降王世充一役，此役分兵兩路，打竇由李世民出馬，圍王由李元吉承擔，沒有元吉的圍王，李世民不可能獨力成功。照理，平定山東所得的人才以及精兵猛將都應該歸公，李世民卻據為私有，把新得的兵將作為秦王府私甲，想擴充自己的實力以覬覦大位，於是引起了李淵的警惕和建成、元吉的抵制，最後消滅劉黑闥等戰役就不再任命李世民而讓建成、元吉充任指揮官，而建成、元吉同樣完成了任務，可見建成、元吉的才能並不亞於李世民。至於玄武門軍事政變，是李世民糾集其妻舅長孫無忌以及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等文武死黨的一次冒險行動，僥幸襲殺建成、元吉，逼李淵讓位當高等囚犯式的太上皇而自己取得政權。關於這點，沒有學過馬克

思主義的章太炎先生當年就覺察到，他曾指出：“太宗以削平東夏自伐，故思奪宗，與（隋）煬帝以平陳自伐無異，奪宗之事，太宗與煬帝等，房、杜爲之謀主，與楊素等，凡事爲耳目所習者，其取法也易。”李世民當皇帝後的政績雖和隋煬帝不一樣，但奪取政權的陰謀手法卻實在是一個路子。你說這種手法殘酷嗎？爲了自己的私利把親老子軟禁或謀殺，把親兄弟弄垮甚至襲殺，確實很殘酷，這就是封建主義爲了奪取政權必然出現的現象，即使李世民這樣享有大名的皇帝也難例外。把這些事實的真相逐個弄清楚，讓人們看看封建主義是什麼貨色，就是對封建主義作無情的批判。

歌頌李世民者往往喜歡在用人和納諫上做文章，其實真相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任何封建統治者爲了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總要結集一幫子人搞小集團，由這個小集團中利害相關休戚與共的一幫子人共同出點子處理問題。在這裏確實不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不僅李世民如此，李淵也是如此，建成或元吉上了臺也會如此。李世民之所謂肯納諫者，也無非是出於私利採納其集團中人的意見而已，這和無產階級政治家爲人民大眾的利益開展批評自我批評根本是兩回事，決不宜比附。至於用人，有人認爲李淵及建成元吉等保守，只用關隴人，李世民才廣開才路，這也是不顧事實真相的臆說。太原是李淵最早的根據地，所以李淵起兵前早就用了許多山西人，如輔佐李淵的第一號人物裴寂就是山西人（附帶說一下，此人後來隨李淵而垮臺，所以《舊唐書·裴傳》中對他加了許多誣陷不實之詞，而把他的功勞一筆抹殺），以後經營山東（包括今河南、山東、河北等省）當然也要大量吸收山東人材，無奈很多已被李世民搶先變成自己的私黨，而建成、元吉之和李世民爭奪山東人材的鬥爭也十分激烈。我曾作了個統計，發現無論李世民或李淵以及建成、元吉手下都既有關中人，又有山東人，既有

豪門世族出身的，又有庶族地主以至不是地主的庶族出身的，其用人標準都是一樣，誰有能力而且忠於我個人爲我出死力我就用，誰靠不住甚至反對我那就非貶殺不可。至於像魏徵這個山東人，本是建成的私黨，建成被殺後又見用於李世民，這也不是李世民有什麼容人之量，而是因此人有能力，又馬上自動投靠李世民，替李世民出力招撫山東人。李世民對他爲什麼會不用！但成爲李世民最親信的人還是够不上。李世民一生最親信的是長孫無忌，此人是李世民的舅子，又是李世民手下搞陰謀殺建成、元吉的首功。後來加上一個褚遂良，此人是靠檢舉揭發別人起家，李世民認爲他“甚親附於朕”，像“飛鳥依人”般地可愛。當時的宰相可多可少，沒有定員，到李世民死去前在宰相位上的竟只剩了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兩個。這不能說是李世民早年英明晚年昏暗，而正是從私利出發用人的必然結果。凡封建統治者無不如此。這怎麼能和我們今天的廣開才路相提並論呢？從私利出發的用人對我們的廣開才路有什麼借鑒意義呢！

因此我主張歷史工作者的任務首先要揭示歷史真相，把封建社會的事的真相和人的本質如實地弄清楚，這樣封建主義壞在哪裏也就可不言而喻。我認爲歷史工作者對批判封建主義的作用主要應在於此。我目前指導研究生研究唐代政治史也想在這方面出一把力。當然封建社會也給我們留下寶貴的歷史遺產，那應是文化方面更多一些，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政治上的某些政略策略，也有些可取的遺產，但必須注意到這些都深深加蓋過階級的烙印，照搬照鈔，把這些和今天的政策措施作類比，恐怕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

對“四人幫”的影射史學，大家是深惡痛絕了，但從良好的願望出發，從另一種角度搞影射行不行呢？譬如江青爲了要當女皇

美化武則天固然荒謬，反過來把武則天罵成活江青可也不能說對，封建社會的政治人物武則天怎麼能和社會主義社會裏的野心家江青相類比呢？同樣，要批判我們今天社會上殘存的封建主義，也決不能用某個封建帝王如李世民之高明來作對比。我們要用無產階級的標準來要求我們的領導幹部。至於封建帝王將相，我很欣賞《人民日報》上某個同志文章裏所說的，“白給也不要”。

《晉陽學刊》進行關於封建主義問題筆談，我僅對報刊上歌頌唐太宗這個支流，本着史學工作者的立場談點看法。

（原載《晉陽學刊》1981年第3期）

釋“土伯九約”

《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肱血拇，逐人駸駸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王逸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猶狺狺，角利貌也。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主觸害人也。”朱熹集注亦襲用其說。

案《莊子·在宥》：“流共工於幽都。”（《孟子·萬章》、《書·堯典》作“幽州”、“幽洲”，《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謂“誅共工於幽州之都”。州、都一音之轉）《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禮記·祭法》作“共工氏之霸九州”）《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此共工既居幽都，子句龍又為后土，與王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之語正相吻合。《說文》：“句，曲也。”段玉裁注：“凡曲折之物，侈為倨，斂為句，《考工記》多言‘倨句’，《樂記》言‘倨中矩，句中鉤’，《淮南子》說獸言‘句爪倨牙’，凡地名有句字者，皆謂山川紆曲。……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鉤乙之意。古音總如鉤，後人句曲音鉤，章句音屨，又改句曲字為勾，此淺俗分別，不可與道古也。”是句龍本義，實龍蛇曲蟠之謂。《山海經·大荒西經》郭璞注引《啟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大荒北經》

曰：“共工臣名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皆其類已（《海外北經》作“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郭璞注“相繇”曰：“相柳也，語聲轉耳。”）。然則《招魂》所謂土伯，蓋即后土句龍，或如王注所說為“后土之侯伯”即句龍臣屬若相繇者。所謂“九約”，狀其曲蟠自環。九或通糾（《論語·憲問》“桓公九合諸侯”，《左氏傳》作“糾合”），或與相繇之九首同源於九有、九土。“約”王注訓屈，則自至當不易（兒童時家江蘇常州，除夕有祀土龍之俗，以麵製龍蛇曲蟠狀，神廟中亦有泥塑者，皆置諸地而不上龕桌，亦古后土、土伯之遺衍）。

顧炎武《山東考古錄》“原鬼”條：“或曰，地獄之說，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日知錄》“泰山治鬼”條同）以夜叉、羅刹擬土伯，於是九約之本義堙而異釋蜂起。蔣驥《山帶閣注楚辭》：“約，尾也。”謂土伯有九尾。俞樾《俞樓雜纂》：“按王氏解九約殊不成義，疑約乃觸之假字，字亦作觸，……《廣雅·釋詁》：‘觸，出也。’其字從角從弱，其義當為新出之角，九約、九觸，即謂九角也。作約者以音近通用。《左傳》‘齊國弱’，《公羊》作酌。約之通作觸，猶弱之通作酌矣。”是謂土伯有九角。近郭沫若《屈原賦今譯》釋約為繩索，高亨《楚辭選》讀約為朐，馬茂元《楚辭選》又引《呂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旄象之約”以為說。凡此皆就訓詁通假牽強附會，讀之誠有畫鬼魅易之歎（“旄象之約”，蓋旄牛之尾，與夫象獸之鼻皆屈曲，遂謂之約，此適足為王逸訓約為屈之佐證）。

然王注亦非遂無疵病也。其解“敦肱血拇”二語，謂：“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駭駭，其走捷疾，手中血漫污人也。”“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也。”而《文心雕龍·辨騷》承之遂有“土伯三目”之語。其實此二語所云固別有所指，

初非土伯之謂，故下文總之以“此皆甘人”。否則，苟如王注此數語悉言土伯，則“皆”字轉無着落矣。集注於此止謂“敦，厚也。肱，背也”云云，不言其狀土伯，此宋儒精密有逾漢人處。乃郭氏《今譯》轉從王注之失，謂此數語皆狀土伯，而創土伯有九之說，以期“此皆甘人”之“皆”字有所着落。復云古謂天有九重，地亦有九層，所謂九地、九京、九泉、九原者，故必有九土伯以分掌之。然天有九重，將亦有九天帝以分掌耶？要皆自我作古而已。

（原載《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新二輯，1991年）

評徐中舒先生“委蛇”論

徐中舒先生釋“委蛇”爲虎之變態，其理由中最堅強之點，爲所引據的《爾雅》與《說文》。現在就將這二書所云，逐一加以討論：

《爾雅》(《四部叢刊》景宋本)《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璞注：“泥，少才力。”郝懿行《爾雅郭注義疏》(郝聯薇重刊咸豐胡挺本)：“邵氏《正義》引《說文》云：委虬，虎之有角者也。委威聲近，虬有夷音，如周道倭遲，《韓詩》作周道威夷，是威夷即委虬矣。《廣韻》云：虬，似虎有角，好行水中。按《釋文》：泥，奴細反。若依《廣韻》好行水中，則泥應讀如字。”所謂“《韓詩》作周道威夷”，案之通志堂本《經典釋文》及《四部叢刊》景宋巾箱本《毛詩》所附釋文，均曰“韓詩作倭夷”。惟《文選》顏延年《秋胡詩》：“行路正威遲。”李善注：“……《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當爲疏語之所本。案“威”在《廣韻》入上平八微，屬古韻第十五部，與“倭”之入上平五支屬第十六部者不同，然案以聯緜字“字隨音轉形無固定”的原則，則“威夷”之即“委虬”或“委蛇”，當無疑問。現在所當討論的，便是《爾雅》作者眼光中的“威夷”，究爲何物？《爾雅》本文只說“威夷，長脊而泥”。郭注也只注一個“泥，少才力”。意義都欠明白，因此疏便旁徵《說文》，以作解釋。案“委虬”誠然就是“威夷”，但《說文》作者想像中的“委虬”，並不一定會全同於《爾雅》作